

創業重塑勞動

我所提出的「創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概念，其核心在於將個體化的創業者塑造為推動經濟發展的英雄形象，對其投入巨大資源並推崇備至；同時堅信將個體差異順暢地轉化為經濟價值，是激發資本主義活力的關鍵機制。這一思潮在2008年後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下尤為凸顯，但其影響力實為全球性現象。世界各地的個人與機構，都在此浪潮的推動下投身於自我重塑，力求轉型為「創業者」。他們迫切地需要將自身的文化背景、社會地位和歷史經驗轉化為可盈利的資源，並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將自身作為「企業」般精心運營。

這種全球趨勢可見於多國實踐：英國自1990年代末起，伴隨文化產業中自由職業群體的壯大，「藝術與文化創業」實踐顯著加深了該領域的商業化程度；¹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美國，盛行的品牌話語極力頌揚個體化的文化創業者，將其標榜為極度「自由」市場的積極參與者；²印度在1991年經濟自由化後興起的「創業公民」(entrepreneurial

citizenship) 理念，則更具集體主義和發展主義色彩，它向所有人——從最弱勢到最優勢群體——承諾「皆可成為創業者」，並要求中產階級的「創業公民」主動「在印度貧困的多樣性與邊緣性中發掘價值機遇」；³同樣，2000年代中期，加勒比島國巴巴多斯啟動的「全球卓越·巴巴多斯傳統」(Global Excellence, Barbadian Traditions) 國家戰略，也試圖通過重塑本土「聲譽靈活性」(reputational flexibility) 傳統來擴展創業精神，並同步削減社會福利與國家義務。⁴

1732年，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將「創業者」定義為通過協調工人與消費者之間的供需關係並承擔風險以獲取利潤的主體。⁵在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創業者主要被歸入生產的輔助要素——或被視為「熟練勞動力」(skilled labor)，或被界定為「資本提供者」(providers of capital)。⁶然而，進入20世紀中後期，隨著新古典經濟理論將市場機制塑造為制衡國家力量的核心，創業者的地位發生根本性轉變：他們取代普通勞動者，被推崇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⁷

「創業至上」理念已成為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其興起與鞏固源於20世紀中後期的兩次重大文化轉向：首先，後凱恩斯主義時代新古典經濟學的崛起，將個體創業者塑造為理想的經濟主體，進而為新自由主義政治的全球霸權奠定了知識基礎。⁸當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亟待破解時，自力更生的英雄式創業者被推舉為自由市場的象徵圖騰，而僵化的官僚體系與被動依賴社會福利的群體則被建構為其對立面。⁹

其次，冷戰結束後出現的文化認知範式轉型——文化研究學者喬治·尤迪塞(George Yúdice)所稱的「文化的權宜之計」(the

expediency of culture)。這種新型認識論在多元文化主義的話語遮蔽下，將種族、性別、民族國家及地域等差異轉化為可資本化的競爭要素，最終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價值收割。¹⁰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啟改革開放進程，標誌著其逐步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此背景下，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策制定者與知識精英採納並本土化了以創業為核心的市場化話語。¹¹一批受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形成共鳴，共同推崇並強化了放鬆管制、市場自由化和私有產權神聖化等新自由主義核心準則，卻普遍未能對這些準則的前提與後果進行深入批判性審視。¹²在經濟學理論層面，這種傾向主要表現為對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選擇性吸納與應用，該學派強調制度(尤其是產權和交易成本)對經濟績效的決定性作用，可視作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的一種重要變體。由此，中國市場導向的改革派學者傾向於將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詮釋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實踐，視其印證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信條。¹³然而，弔詭的是，他們同時認為中國的改革遠未徹底，指出「產權界定不清、合同執行不力，以及政府深度介入經濟活動」等制度性缺陷，共同構成了對創業者「不友好」的市場環境——這一診斷本身，恰恰又隱含了對新自由主義理想市場狀態未能完全實現的焦慮與批評。¹⁴

與此同時，一種文化本質主義(cultural essentialism)的敘事開始興起，它將本土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倫理)與市場原教旨主義進行融合再造，頌揚冷戰結束後在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包括中國)中崛起的所謂「儒商」現象。不可否認，這種與文化主義相結合的創

業精神重塑，及其伴隨的慶祝式話語，客觀上起到了挑戰歐美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理論霸權、提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和半邊緣地帶人群文化自信的作用。然而，這種敘事存在著深刻的簡化論傾向：它將特定歷史時空下（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加速期）形成的、具有高度偶然性的經濟關係與過程（如全球產業轉移、特定發展型國家模式），以及經濟基礎與文化上層建築之間複雜的、動態的相互建構關係，本質化（essentialize）為某種超歷史的、決定性的「文化差異」（如「儒家文化促進資本主義」）。最終，這種被建構的「儒商」神話及其文化主義解釋框架，往往服務於特定政治經濟精英鞏固其權力與利益的需求，掩蓋了發展過程中真實存在的權力結構、社會矛盾與不平等。¹⁵

新古典主義、新制度主義與文化主義所鋪陳的「創業之路」，共享著一種深層的認識論簡化機制。在當下歷史節點，三者殊途同歸：它們將創業者扎根於具體文化土壤、飽含偶然性、充滿矛盾與動態演進的鮮活實踐，強行納入靜態的理論框架，轉化為支撐資本主義現狀的知識構件。無論是新古典主義推崇的、以市場理性為基石的「實用現在主義」（pragmatic presentism），抑或是文化主義操演的、將儒家倫理神聖化的「永恆文化主義」（timeless culturalism）。前者將創業者壓縮為精於成本收益計算的原子化個體，後者把歷史情境中生成的商業策略包裝成亙古不變的文化基因，其本質皆是對現實複雜性的理論閹割。這些路徑的真正功能，並非揭示創業活動的真實邏輯與社會嵌入性，而在於將「創業至上」神話鍛造成普世意識形態，進而為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合法性提供學術背書——它們用抽象的理論清潔，遮蔽了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斷裂、暴力與權力不平等。

誠然，「創業至上」已固化為一種具有遮蔽性的意識形態裝置——它建構了一套並不總是映照現實世界運作邏輯的觀念體系。為破除這種迷思，本書採用「創業重塑勞動」(labor of entrepreneurial reinvention) 作為核心分析透鏡，通過檢視個體與集體的真實創業實踐，解構新自由主義關於包容性、賦權與自由承諾的普世敘事。

在此框架下，本研究聚焦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創業創新浪潮引發的勞動體制變革。這些鮮活經驗誕生於一個特定的地緣歷史節點：中國作為國家資本主義與全球金融資本深度互嵌的實驗室，正試圖回應晚期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當下，「創業者」與「勞動者」的界限日益模糊：自僱形態泛化迫使工人以「微型創業者」姿態承擔市場風險，靈活求生成為新生存倫理，而制度性保障持續消解。

本書揭示的「重塑」過程，本質上是一場勞動商品化的再升級：它既呈現特定空間（如珠三角製造業集群、中關村科技園區）中勞動控制技術的路徑依賴，也顯露文化傳統（如家庭互助或「勤勞」倫理的資本化改造）與全球資本邏輯的雜交性耦合。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始終充斥著結構性張力——當政策紅利、技術變革、地方性知識及跨國資本流共同形塑「創業打工人」(entrepreneurial labor) 的生存境遇時，其身體實踐、身分認同與反抗策略亦在不斷裂變重組。

儘管創業勞動在不同階層勞動者中的分佈存在顯著差異，其吸引力結構卻具有普遍性——它承諾自由、靈活、自我實現與創造性表達，更包裹著成為資本佔有者的（哪怕渺茫的）可能性幻象。這種敘事對長期被排斥在制度性特權之外的群體（婦女、種族少數派、全球資本主義邊緣人群）尤具蠱惑力：創業勞動被呈現為突破歧視性經濟結構的個人化解決方案，似乎能繞過僵化的社會再生產壁壘。

然而弔詭的是，這種以「自由選擇」為名的創業至上主義，最終將系統性成本轉嫁機制精巧地內化於勞動者自身：個體被迫承擔技能培訓、職業再適應、勞動力再生產乃至全球資本波動風險的代價。當「創業打工人」在不確定性中心甘情願的自我剝削時，資本成功實現了勞動力成本的深度但更隱性的壓榨。

過去二十年間，此種金融化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已引發多重危機：貧富鴻溝的裂變式擴張與普遍不安全感相互強化，家庭債務泡沫同社會福利退潮共生演進。這些矛盾揭示出，建立在創業意識形態之上的積累體制，正因其內在的不可持續性而走向系統性潰敗。

創業至上主義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擴張，於2008年經濟衰退後呈現出悖論性存在：它既滲透至社會毛細血管成為霸權話語，又因引發系統性危機而遭遇空前質疑。這場金融海嘯絕非偶然事件，其根源深植於南希·弗雷澤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跨領域衝突」(crisis of inter-realm contradictions)——當經濟領域的無限積累邏輯，持續榨取社會再生產領域(家庭/社區)、政治領域(公共治理合法性)及生態領域(自然代謝循環)的維繫根基時，系統性崩潰必然爆發。¹⁶

2008年後，美國的創業精神不斷膨脹，債務、社會再生產和環境的危機日益加深。階級(99%對1%)、種族(#BlackLivesMatter)和性別(#MeToo)的不滿情緒一觸即發。在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中，矽谷重新成為經濟中為數不多的亮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社交媒體、共享經濟以及優步(Uber)、WeWork和Airbnb等數字平台。這些平台的興起正值創業精神日益高漲的時期，平台一定程度上順應並收編了民眾尋求社會變革的鬥爭，為資本主義注入了新的活力。¹⁷例如優步打造了一個為司機賦權的平台，無論司機背景如何，

都可以「自己當老闆」，進而蒸蒸日上。¹⁸然而，對新自由主義和創業至上的批判聲浪越來越大。於是我們看到西方媒體中吹捧「自己动手」(DIY)職業的文章與「創業者是新勞工」、「工作的優步化如何植根於『股東價值』崇拜」等標題交相呼應。¹⁹

在太平洋彼岸，中國2008年後的經濟轉型涉及混合經濟的長期結構性調整。這不僅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也是為了緩解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後日益加劇的社會、政治和生態危機。尤其是2008年的危機加劇了中國對出口導向型、投資主導型發展模式不可持續性的擔憂。作為權宜之計，胡錦濤—溫家寶政府(2002—2012，下稱「胡溫政府」)頒佈了一項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但是，當新一屆習近平—李克強政府(2012—2022，下稱「習李政府」)在2012年末接手時，經濟放緩的跡象已無法忽視。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否向更具社會、經濟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轉型，同時保持合理增長，這樣的擔憂不斷升級。

在這種焦慮的氛圍中，與信息技術相關的創業精神在中國的社會經濟重塑中承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與美國相比，中國2008年以後的創業重塑由國家、市場、個人和家庭之間截然不同的關係所決定。

信息技術的創業至上與投資型國家的出現相吻合。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創業來解決發展、社會公平和國家技術獨立的問題。如今，國家政策週期對商業機會和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國企混改」)和國家引導基金等新實驗模糊了公私界限。同時，儘管有個體化的趨勢，基於家庭性別分工的企業仍然十分普遍，並在電子商務行業中獲得了新生。也就是說，與美國相比，中國經濟在

更大程度上仍然是混合經濟，市場更深地被嵌入到國家權力和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再生產之中。

中國的創業熱潮在2015至2016年達到了頂峰，期間發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風險資本熱潮和國家政策推動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運動。然而，2015年股市崩盤、不斷增加的政府和企業債務以及中美貿易戰削弱了投資者的熱情。公眾對內捲式競爭的不滿也在加劇。隨之而來的是各行各業的創業打工人越來越將自己視為一種新型態的勞動者，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創業者。自2020年以來，作為解決多重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案，創業至上的局限性在太平洋兩岸都變得顯而易見。當內捲和產能過剩成了熱門話題，中國和美國的創業者感到被資本和彼此擠壓著，而美國對中國的想像也從資本主義全球分工中戰略性夥伴關係轉變為一種生存威脅和產業競爭對手。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學術視角和社會分析框架來擺脫對創業至上不加批判的崇尚去揭示個體或集體重塑勞動的矛盾。這個分析框架必須闡明全球力量、地方特性、生活經驗的歷史性和全球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審視中國在2008年後擁抱創業至上的歷史背景，可以揭示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普遍性」與當代中國的「特殊性」相結合的具體方式。

追蹤中國創業重塑的軌跡

我的受訪者在「創業重塑」的過程中，其勞動經歷深受全球平台化與金融化浪潮的影響。然而，他們的具體經驗又各不相同，取決於他們如何以不同方式與路徑參與到中國混合經濟的再造之中。與

理想化的美國新自由主義模式中由所謂「自由市場」推動的創業個體不同，中國的混合經濟依然深深嵌入於國家權力、親屬網絡等社會制度結構之中。

本書雖然關注時空特殊性，但拒絕將「文化特徵」本質化，而是將其置於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相互遭遇的歷史與空間語境中加以理解。從這一視角出發，2008年後中國各類個體在創業重塑中的勞動，構成了在特定文化場域與歷史時刻下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回應。穿透「創業至上主義」的歡欣敘事，我們可以看到隱藏其後的複雜矛盾。在中國追蹤這些矛盾的軌跡，既要避免同質化中國的多樣經驗，也要超越中國與「西方」的簡單二元對立。相反，本書著力揭示的是，當代中國社會與經濟看似激進的轉型之中所延續的深層路徑依賴和於此伴生的矛盾。

在西方，由資產階級倡導、國家扶持的自由主義經濟強調「自我調節的市場」邏輯。與此相對，20世紀以前的中國經濟則更深刻地根植於國家與親屬網絡等社會制度之中。²⁰ 中國傳統經濟模式顯然有別於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它是一種以小規模資本與朝貢體系互動為特徵的農業經濟。小資本主義將農業與非農生產組織成以宗族為基礎的家庭單位，由家族中的父系男性主導，並依靠年輕人、婦女與老年人的免費或低薪勞動。與此同時，朝貢體系則通過政治命令或軍事力量等非市場手段獲取剩餘價值。²¹ 這些經濟與社會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遲滯與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挫敗。²² 也正因為如此，這種「欠發達」形態反而使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比在工業化程度更高的西方社會更具吸引力，²³ 並推動中國在20世紀下半葉走上了一條獨特的社會主義主導的現代化與工業化道路。